



回来的路

The Long Walk

【波兰】斯拉沃米尔·拉维奇 ● / 张富华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回来的路

(波兰) 斯拉沃米尔·拉维奇 著

张富华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回来的路/(波)拉维奇著;张富华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6
(独角兽文库)

ISBN 978-7-5675-3722-4

I. ①回… II. ①拉… ②张… III. ①长篇小说—波兰—现代 IV. ①I5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34454号

The Long Walk : The True Story of A Trek to Freedom by Slavomir Rawicz.

Copyright © 1956 by Slavomir Rawicz.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itken Alexander Associates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The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5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The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 Law Press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9-2015-152 号

回来的路

著 者 (波兰) 斯拉沃米尔·拉维奇

译 者 张富华

特约编辑 李立东 史芳梅

项目编辑 陈 斌 许 静

封面设计 白咏明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 市 (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址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32开

印 张 8.75

字 数 165千字

版 次 2015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7月第1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3722-4/I.1403

定 价 35.00元(精装)

出 版 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021-62865537联系)

经典照亮前程

福建人民出版社



七叶树文化出品

谨以本书
铭记所有为了争取自由而慨然生死的勇士，
以及所有由于种种原因无法为自己呐喊的人们。

—— 斯拉沃米尔·拉维奇



斯拉沃米尔·拉维奇
Slavomir Rawicz (1915-2004)

生于1915年9月。自1932年起在华沙研习建筑学。1937年加入波兰后备军。1939年夏天完婚，随后便开赴战场。波兰沦陷后，他落入苏联人手中，被关押入狱，从此告别故土与家人。

二战结束后，他定居英国诺丁汉地区，并在诺丁汉设计中心工作。1947年再婚，与妻子玛乔丽（*Marjorie Needham*）育有五个孩子。因心脏病影响，他于1975年退休。此后与家人过着平静的生活，并致力于为波兰的孤儿募款。2004年4月，他以年近九十的高龄辞世。

回来的路

The Long Walk

第一章	哈尔科夫与卢比扬卡	1
第二章	审讯与判决	12
第三章	从监狱到牲畜运输车	23
第四章	乘火车三千英里	37
第五章	链锁囚犯	47
第六章	旅程结束	58
第七章	303营地生活	67
第八章	指挥官的妻子	80
第九章	逃跑计划	92
第十章	七人渡勒拿河	105
第十一章	贝加尔湖与逃亡女	117
第十二章	克里斯蒂娜入伙	129
第十三章	穿越西伯利亚大铁路	140
第十四章	八人入蒙古	153
第十五章	生活在友好的蒙古人当中	166

第十六章	戈壁滩：饥饿、干渴、死亡	177
第十七章	蛇肉与淤泥	191
第十八章	走出戈壁	203
第十九章	六人入藏区	214
第二十章	五人过拉萨	227
第二十一章	喜马拉雅山麓丘陵	240
第二十二章	喜马拉雅雪人	251
第二十三章	抵达印度	263

第一章 哈尔科夫与卢比扬卡

十一月的一天，阴冷萧瑟。上午九点，卢比扬卡监狱中，我牢房的大锁里有钥匙在转动，接着，两个宽肩膀的看守有目的地走了进来。当时我正慢慢地走来走去，左手提着配给裤子的裤腰，这是囚犯提裤子的典型姿势。俄国人巧妙地把这些配给裤子设计得没有纽扣和束腰绳，非常合理地以为，一个忙于提着裤子的人，想要逃跑是颇为不便的。听到开门的声音，我停下了脚步。他们进来的时候，我恰好正对着门站着。其中一个看守站在门边，另一个往里迈了两三步。“出来，”他说，“走。”

对我来说，这一天——1939年11月19日，我在平斯克被捕十二个月之后的这一天，非常重要。我被带到苏联最高法院接受审讯。我拖着脚穿过卢比扬卡监狱狭窄的走廊，两边跟着看守，回声充满走廊。在这里——莫斯科——我几乎被剥夺了身份，营养不良，极度孤独，在监狱里阴湿的环境中，在处心积虑的官方仇恨和怀疑面前，努力地坚持着几分抗争。就在一年前，当俄国安全人员走进母亲在平斯克的家中为我安排的接风晚会时，我还是波兰骑兵中尉拉维奇，二十四岁，瘦削而帅气，身着剪裁考究的制服、合体的马裤，脚蹬锃亮的马靴。而我现在的情况，恰如一曲赞歌，颂扬着明斯克和哈尔科夫的内务人民委员会（苏联

秘密警察）审问者无休止的残忍和专业化的阴险。没有一个囚犯忘得了哈尔科夫。疼痛、肮脏和羞辱，他们试图以此把一个人变成一头抽泣的牲口。

我们拐过走廊的最后一道弯，沿着台阶往下走，进入一个鹅卵石铺就的院子。寒气迎面扑来。我拽了一下裤子，快走几步，跟上看守。从我们离开牢房，他们就没有再说过一句话。到了院子的另一边，我们在一扇沉重的门前停下来。其中一个看守拉了一下我那件没有系扣子的松垮的上衣，把我往后拽了一步。那件上衣，外加裤子，就是我在狱中的所有配备。门开了，他们走上前去，把我推到另外两个穿制服的人手里。四只手迅速地在我身上游走，搜查我身上是否藏有武器。没有人说话。我被带到里面的另一扇门。门就像收到了暗号一样打开了，我被推了进去。门里面的凹处遮着一道帘子，我再次被推了进去。门在我身后关上了。这次又换了两个看守，在我身后立正站着。

房间宽敞，温暖宜人。墙面刷了白色的油漆或者涂料什么的，很干净。一张长条形的大桌子，将房间一分为二。这一边，没有任何家具，整个空间都属于我和两个看守。桌子的另一边坐着一排人，大约十五个，其中差不多有十个人穿着内委会的蓝色制服，其余的人都穿着便装。他们非常悠闲自在，有说有笑，做着手势，抽着烟。没有一个人瞅我一眼，哪怕是不经意地瞥一眼。

约莫十分钟以后，我把穿着帆布鞋的脚（帆布鞋上有穿鞋带的孔，但没有鞋带）在光洁的镶木地板上挪动了一下，想知道是不是弄错了。肯定是有人弄错了，我想。我其实根本不应该在这里。然后，一个内委会上尉向我们这边看了看，让看守稍息。我听到背后传来他们的靴子击地的声音。

我站在那里，尽量避免局促不安。我环顾四周，惊讶地发现在几个月的疲惫乏味之后，自己终于得以有气无力地享受一种新的经历。一切那么干净。到处都是一股很随便的气息，令人觉得舒服。我仿佛接触到了监狱高墙之外的世界。进进出出的人流络绎不绝，笑着与桌子另一边的那些人聊天，他们胳膊肘懒散地搭在华丽的红色毛绒桌布上。有人问一个内委会少校什么时候放假。也有人愉快地打听另一个人的一大群孩子。其中有一人，身穿得体的深灰色西式套装，看上去像一位成功的外交官。似乎每个人都想过去奉承他两句。他们叫他米沙。后来我牢牢记住了米沙。我永远不会忘记他。

桌子另一边我正对的墙上，挂着苏联国徽，是用某种石膏铸成的，颜色非常鲜艳。它的两边都是俄国领导人的画像。现在我能到处来看去，便毫不掩饰我的兴趣。没有人管我。我把提裤子的左手换成右手。我注意到有三个拖着帘子的门口通向这个房间。我还观察到，长长的桌子上，只有一部电话。这张大桌子的中心位置前方，是一个旧式的实心黄铜钢笔座，形状是一个锚和两支交叉的桨，还有一个玻璃墨水瓶，都立在一块大理石或者雪花石的大底座上。

聊家常的声音从桌子那边流淌过来。一年了，没有人跟我说过一句友好的话。在监狱严格执行的“绝对沉默”的规则下，我也越来越深地陷入了孤独的低谷。此时，我觉得这一天是最令人难忘的一天。

我站在那里，身着肮脏破旧、不成样子的两件套监狱服，丝毫不觉得自己与那些心情愉悦、衣着考究的俄国人有什么不协调。十个月之前在明斯克的时候，一个波兰骑兵军官桀骜不驯的傲慢

是他们的首要攻击对象。他们不留情面地让我当众剥光衣服，作为第一次审问前的准备。在我被迫脱掉制服、高档衬衣、靴子、袜子、内衣的过程中，俄国军官们在懒洋洋地微笑。我站在他们面前，被剥夺了尊严，羞耻难当，忧心忡忡地察觉这是即将降临到我身上的所有厄运的真正开始。他们观察完我之后，笑了，最后把背转向我。过了很长时间，他们才扔给我囚犯穿的裤子和上衣，上衣是男女通用的俄国衬衫。紧握着那该死的、可憎的裤子，我仔细打量拷问我的这些人，第一次听到了后来成为我监狱生活主题的调查表。

姓名？年龄？出生日期？出生地？父母姓名？父母国籍？父亲的职业？母亲婚前的姓氏？母亲国籍？总是千篇一律。开头的问题是按照调查员手里挥动的文件上列明的顺序进行的。第一次审问的时候，他们非常友好，给了我一杯咖啡，装作没注意到我只能一只手端杯子的尴尬。其中一个人还递给我一支烟，然后显然意识到我一只手没法点烟，于是装模作样地摆出一副惋惜的样子，转过身子，帮我点上了。

随后是其他的问题。危险的问题。

1939年8月2日你在哪里？被波兰军队调到西部跟德国打仗。我会这么说。

但是，他们会说，你对波兰东部很熟悉。你家人都住在平斯克。非常接近波俄边境，不是吗？像你这样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要穿越边境很容易，不是吗？

我小心翼翼地否认，抹掉我十几岁时穿越边境去俄国村庄的记忆。之后，审问节奏加快了。他们两个人一人一句交替提问。一连串俄国村庄的名字。你知不知道这个地方或那个地方。这个

人你一定见过。我们知道你见过他。我们的共产党地下组织跟踪过你。我们一直都知道你见过哪些人。我们知道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你是不是在为军事情报局工作？

你俄语说得很流利？是的，我母亲是俄国人。

她教了你俄语？是的，从小就开始教了。

军事情报局很高兴有一个会说俄语的波兰军官给他们做间谍？不。我是一名骑兵军官。我在西部打仗，不在东部。

接着他们会问我的薪酬。这第一次审问，是以“咱们都是好兄弟”的友好方式进行的。一份文件放到我面前，一支笔塞到我手里。“这个，”那位面带微笑的内委会少校说，“是你的调查表，上面有你的回答。你只要在这里签字，我们以后就不会再打扰你了。”我没签。我说我不会在一份向我隐瞒了内容的文件上签字。少校微笑着，耸了耸肩：“你会签的，你知道——总有一天你会签的。你今天没有签，我为你感到难过。非常，非常难过。”

他脑子里一定在想哈尔科夫。

接下来开始了斯拉沃米尔·拉维奇和内委会人员之间的意志之战。我很早就意识到他们没有对我不利的确切信息。他们只知道我的军队档案上记录的内容，并能在平斯克查明我的家庭背景。他们的指控完全是基于他们坚信住在俄国边境附近的所有受过中上层教育的波兰人无一例外都是间谍，都曾秘密而积极地参加过不利于俄国解放日的活动。我不知道他们所提到的任何一个地方，也不认识他们试图让我承认是同谋的任何一个人。有好几次他们引诱我承认与他们所说的陌生人相识，以减轻我的精神和肉体的痛苦。我一直没有。在我心里，即使是在我精神几近崩溃的时候，

我都明白，一旦我承认，后果将不堪设想。

1940年4月，庞大的石头城堡监狱哈尔科夫向我打开了它阴森的层层大门。虽然对明斯克的严厉有所领教，但我还是没有准备好迎接哈尔科夫的恐怖。在这里，一个超凡的天才、外号“公牛”的内委会少校极负盛名。他体重约十五英石^①。浓密的姜色毛发布满头上、胸前和那双红色大手的手背。他上身长而强壮，双腿短而结实，胳膊长而有力。一张有光泽的红脸顶在一根筋脉膨胀的粗壮脖子上。他是主审官，对待自己的工作极为严肃。他恨透了那些不肯服软的囚犯。当然，他也憎恨我。至于我本人，即使是现在，就算杀了他也不会觉得有一丝愧疚，而是满心欢喜。

“公牛”在内委会内部肯定也是个不凡之人。他审问的时候，就像一个著名的外科医生，总是在一群群不同的下级军官面前炫耀自己的技巧。那些军官就像一帮学生在围观一个有趣的手术。他的手段高明得无耻。拖垮那些顽固囚犯的过程，是先把他们关在基什卡中，那是一间烟囱似的牢房，走进之后会发现，牢房地面低于外面的走廊水平高度约一英尺。里面只有站的地方，没有多余的空间。四周的墙壁造成一种紧紧逼迫的压抑气氛，像一口石棺。二十英尺高的房顶上，有一个看不见的小窗户，光线从那里射进来。只有当囚犯要被带去见“公牛”的时候，门才会打开。我们站着拉撒，然后就那么站在自己的秽物里。基什卡从来不打扫——我在哈尔科夫那间牢房里待过六个月。去见“公牛”之前，我会被带到“洗澡间”——那是一个带抽水机的小房间。没有什么设备。没有肥皂。我把衣服脱下来，抽出冷水把衣服冲

^① 英石 (stone)，英国重量单位。一英石等于十四磅，即 6.35 公斤。——译注

洗、揉搓、放在脚下踩、拧干，然后穿在身上晾干。

还是同样的问题。它们来自同一沓文件，那些文件跟着我从一所监狱到另一所监狱。只是公牛得到我签字的欲望比任何人都迫切。他脏话连篇地咒骂，时常爆炸一样地大发雷霆。一天，经过几个小时不间断的吼叫和威胁之后，他突然一下掏出了军用手枪。他两眼放光，脖子上青筋暴突，把枪口对准了我的太阳穴。我闭上眼睛，等待着。他站在那里颤动了将近三十秒钟。然后，他退后一步，将枪托猛地砸在我的右颞上。我喷出了那边所有的牙齿。第二天，我的右脸肿了，嘴巴里面的伤口还在流血。我再次见到了他。他在微笑。他那一小群崇拜者兴致盎然地端详着他的杰作。“你看上去歪了。”他说。然后他用枪托打了我的另一边脸。我又喷出几颗牙齿。“这样你的脸就会正过来了。”

有一天，他们从我的脑袋上刮掉了半个头顶大小的一片头发。我半个屁股仅仅碰到椅子边，一直那样坐着受了四十八个小时的审问。其间俄国士兵接力式地轮流拍打我头上那块秃掉的地方，每两秒钟一下，时间相隔很准确。而“公牛”则大吼着发问，恶狠狠地瞅着我，偶尔作出友好的样子，引诱我在那份该死的文件上签字。

然后我被带回基什卡，回到挥之不去、令人作呕的恶臭中，回到长时间的、极为难受的半睡半醒中。基什卡这个名字不错，意思是“肠子”或者“肠管”。当我醒来的时候，通常是我劳累的双膝弯了下去而不得不重新站直的时候，我的脑子里只有“公牛”。他占据了我全部的生活。有那么一两次，值班的看守给我推进来一支点着了了的烟。这是我在哈尔科夫唯一见到的人性化动作。我本可以感激涕零的。

有时候我会想，我这一辈子就搭在那里了。“公牛”看来是准备跟我永远耗下去了。长时间的审问，弧光灯的强光使我的眼睛泪如泉涌。反手绑在一张窄窄的长凳上，我正对着灯光，他则一圈一圈地在灯光焦距之外的昏暗里走来走去，不停地提问、羞辱，把我推进专为顽固、狡猾的杂种波兰间谍这类苏联敌人准备的最深层的地狱。他不知疲倦而又残忍的力量非常可憎。当我模糊的眼睛开始闭上的时候，他会用小棒把它们撑开。滴水术也是他的长项。一个容器安装在长凳正上方，一滴滴冰凉的水正好稳稳地滴在我头上那块秃掉的地方，滴得非常有规律，连续好几个小时不间断。

白天和黑夜都已经没有了意义。“公牛”想什么时候叫我就什么时候叫我，不管是午夜还是黎明抑或别的时间。我总是麻木又好奇地猜想，他又想出了什么招数对付我。那些看守会带我穿过走廊，打开门，把我推进去。有一次，“公牛”正跟他的六个内委会学生等着我。他们站成一溜，每边站三个，那位大才子则站在离他们几步远的地方。我得经过他们才能走到他跟前。没有人说话。耳朵上方一记重拳，把我从一边打到另一边。没有人说话。他们残忍而高效地把我从一边打到另一边。他们踢我的脚，直至我倒在地上。打完之后，我再也爬不起来了。这时候，“公牛”走过来，使出最后致残的一脚，踢在我的肋骨上。然后，他们把我抬到同一把旧椅子座沿上，继续提问，文件在我脸前晃来晃去，一支笔塞到我手里。

有时候我会对他说：“让我看看文件。你别想让我在还没看过的东西上签字。”可是他从来不让我看。他用粗手指戳着我该签字的地方：“你只要把你的名字写在这里就行了，之后我不会